

历史纪事

清代的兴宁

廖衡胜

一、清初动乱年代

清初兴宁第一任知县庄应诏，江苏无锡人，明崇祯十七年（1644）任，清顺治四年（1647）去职。

明朝末年任命的兴宁知县，何以能继续任职至清顺治四年？这里有一段明清政权的交替过程。1644年，满族在北京建立清皇朝，世祖福临登基，建年号顺治。其时，明皇朝裔孙相继在东南沿海各省建立小朝廷，史称南明政权。如顺治元年（1644）福王朱由崧称监国于南京；顺治二年（1645）六月鲁王朱以海称监国于绍兴；同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顺治三年（1646）永明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这几个抵制满清统治的小朝廷，先后控制着南方各省。但在满清大军压迫下，福王、鲁王、唐王各在位仅一年，便先后瓦解了。只有广东的永明王起伏多次，维持达十五年之久。他于顺治三年称帝，四年流亡广西，而于五年（1648）联络人民起义军和李自成、张献忠旧部，并得到明朝投清将领李成栋、

金声桓等部的反戈支持，抗清声势大振，号令达于粤、赣、湘、桂、川、云、贵七省。六年（1649）清廷命明旧臣洪承畴调遣清兵，经略南方；并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进攻川、云、贵，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进攻广东，孔有德为定南王进攻广西。经过几年战争，抗清势力，终被击溃。清廷乃留吴三桂镇云南、贵州，尚可喜镇广东，耿继茂（仲明子）镇福建，世称三藩。

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行使清皇朝政令，始于顺治八年（1651）。他到任前后，兴宁地方动乱频仍。据张鹤龄咸丰《兴宁县志》（以下简称《张志》）记载，顺治元年，庄应诏任知县，“时值闯、献之乱，盗贼蜂起。公多方措置，鼓励士民，外拒土寇，内抚悍弁，中协士大夫，忧勤备至。”又“顺治四年正月，四营贼万余，破北厢诸围寨，聚灌池塘，连亘数里，攻城甚急。知县庄应诏率众固守。三月十八日，惠州总镇黄应杰统兵追剿，城围解，贼遂溃散。”顺治四年，福建人蔡昆荫继庄应诏任兴宁知县，“时大乱之后，里井萧条，”蔡知县多致力于“殄除余寇。”顺治八年五月，“流寇三千人攻破县城，知县石楚钦，教谕邓吉士，训导许仲翼、典史谭肇先被害，库藏抢劫一空。”顺治九年夏，“贼吴梦周谋乱，署县（即代理知县）金永耀擒之。”

尚可喜、尚之信父子相继以平南王官衔镇守广东达二十余年。康熙十三年（1673）清政府下令撤藩，平西王吴三桂便联络靖南王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平南王尚之信，发起反满运动，历时十年，始被平息告终。尚之信于康熙十五年参加，十六年投降，被续封为平南亲王。反满期间，耿精忠首先于康熙十五年投降，并即率降兵由福建取道潮州，分路

进攻广州，迫使尚之信归顺。大军过境兴宁受到波及。《张志·事略》有一则记载：“康熙十五年春正月，海寇数万自潮州分南北两路并趋惠州。正月十三日至兴宁。”这里所谓海寇数万，似即指耿精忠攻粤的庞大部队。

清政府征服三藩后，南方动乱，始告平息，兴宁治安亦随之而渐趋稳定。

二、税制改革在兴宁的实施

清初征收赋役方式，沿袭明代一条鞭制，将一年应收的税粮、丁役银以及各种摊派，并在一起，计亩征银。但一条鞭制的施行，在明代已多赋役不均的弊端。到了清代，满洲贵族的“旗地”，法定不承担国家的赋役；汉族地主也行使其部分免税免役的特权，将大部分赋役转嫁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以致形成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者无地立锥，反多徭役，迫使农民相率逃亡。清政府面对“丁无定额，丁银难收”的困境，乃巧妙地变更一下赋役的征收方式，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这个诏令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政府所掌握的全国24621324名人丁应征335万余两丁银额为准（平均每丁丁银0.13606两），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此项丁银额，平均摊入全国各地的田赋银中，一并征收，叫做“摊丁入亩”，使丁税和地税合一，以保证财政税收的稳定。

兴宁清初耕地共有378.485亩，依照康熙八年（1669）起造的赤历册，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征收粮饷银，雕漆等银及本色米三项，规定上等田每亩征粮饷银0.028790552两，雕漆等银0.000334972两（共计二分九厘），本色米

0.012058382石；中等田每亩征粮饷银0.02196513两，雕漆等银0.000229389两（共计二分一厘），本色米0.00825758石；三等田地塘每亩征粮饷银0.016084675两，雕漆等银0.000169362两（共计一分六厘），本色米0.006096608石。全部耕地共征折色银10608.9629两，（注：租税征收物品为本色，折算金钱为折色。）及本色米若干。

康熙五十年，兴宁全县16岁至60岁的成丁，共计2113丁。丁役银以每丁0.281121两计征，共征银594.008673两。

摊丁入亩的具体措施，各省不一。康熙五十五年（1716），首先“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零六厘四毫。”（注：此项引文见《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三期彭云鹤《试论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由于各州县丁银和田赋银多寡不同，摊入后，地丁负担发生了不同变化。丁多地少的州县，负担较前减轻。相反，地多丁少的州县，负担则较前加重。兴宁田赋银高达10608.9629两，按田赋银一两摊丁银一钱零六厘四毫计算，丁银多至1128.183652两，比原额增加534.174979两。

兴宁奉文遵行赋役改革，始于雍正九年（1731）。奉行初期是认真的。原则上交纳地丁银以田地为依据，田多者交多，田少者交少，无田者则免交。兴宁是赋多役少地区，按省平均数摊派的丁银，虽比原额增加了一些，但按全县田亩负担的田赋计算，每35.67亩才负担田赋一两，每两加入一钱零六厘四毫的丁银，平均到每亩田中，只增加二毫八丝的丁银，为数就有限了。丁多地小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是在自己应负担的为数不多的田赋银中摊入极小量的丁银，负担比原来减少得多。无地穷民，则暂时摆脱了丁银的赔累，有

了较多的人身行动自由，可以留在农村搞手工业，或到邻近各县做小商贩，或流徙到大城市，甚至到海外去谋生。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他们借口祖宗成例，

“人无贫富，莫不有丁身可役，”反对包赔贫户丁银，但遭到政府的严查重罚。他们的兼并扩张，也受到了限制。

“摊丁入亩”税制实行后，相沿数千年之久的人丁税，便在名义上被彻底取消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也从此逐渐削弱。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不再为逃避丁役而隐匿户口。乾隆以后，人口统计方法也相应改变了，不再是只计入丁，而是总括大小男妇。据阮元《广东通志》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兴宁人口增到262316，为兴宁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人口记录高峰。人口的骤增，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摊丁入亩”在客观上无疑起了某些积极促进的作用。（待续）

往 事 实 录

兴宁县广播电视事业 发 展 概 述

陈义声 陈 捷

建国前，广播事业在兴宁是个空白。建国后，于1950年设了一个收音站，配备干部一人，附属在文化馆内。收音设备仅有一座残旧的电池收音机。直至1952年兴宁县文工团整编时，才由文工团电器器材中拨给一座50W的扩音机、一只美制的高音喇叭、一座电唱机和麦克风（话筒）。收音站的主要任务是收录中央和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供县委部门参考学习；其次是把收录的有关新闻，油印成小报形式，名为《收录新闻》，分发给县主要单位及各工会、街坊、乡镇、学校作黑板报宣传之用。因那时收音机还很稀罕，交通也不方便，广州车二天才可抵达，《南方日报》前

后三天才可读到。所以收音新闻在当时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收音站的收音员先后有汪森华、陈汉权、林利泉。收音站也就是广播站的前身。

1954年春，在县委宣传部长陈伟亲自领导和主持下，兴宁县广播站开始进行筹建工作，具体筹建人为陈捷、林利泉，站址仍设在文化馆内（中山西路钟氏宗祠现文化馆址内）。当时限于经济，因陋就简地将原钟氏宗祠的一座二层楼房，用隔音板间作三间，里面为机务室、中间为播音室、外面为候播室。设置除原收音站的一些残旧家档，新买一部100W播音机，12号10W高音喇叭，安装在热闹的街口，线路仅约长1500公尺，只有单线输送。就这样县广播站算是建立起来了，于1954年“五·一”节开始向城镇群众正式播音。第一条消息是《我县有了广播站》。编播员为陈捷（兼职）、机务员为林利泉。那时建站工作是很艰巨的，设备经费有限，技术力量薄弱，要想找到一个熟悉广播器材安装和修理的技术人员，实在是件大难事。就连机务员林利泉原也是对技术一窍不通的，但他秉着搞一行爱一行的事业心和不怕困难的坚毅精神，一面学习，一面实践，悉心钻研。广播站的所有机器设备都是他花尽心血安装好的，每一条线路、每一只喇叭都是他亲自爬梯挂起来的。后来，他终于成了众所诸知的广播器材安装和修理的熟练技术员，受到群众的称许。1957年被评为广东省广播先进工作者。

1955年广播站开始配备一名专职编播员李培森。同时新添200W扩音机、钢丝录音机、电源升降变压器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喇叭则由街头的高音喇叭逐步向室内低音喇叭过渡，线路逐渐伸展到各大机关单位和各行业工会会址，到年

底喇叭已由原有12个增至35个，线路长达5000公尺。同年，为适应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县委要求建立农村有线广播，向农民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于是选择龙田、泥陂、叶塘、新陂等区借用电话线路试验传输广播。1956年春，广播站迁至大坝里体育馆内，县委派傅汉祥任副站长（站长由县委宣传部范芝祥兼任），着手筹建农村有线广播网工作。其时成立起县农村广播网筹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专业组分片全面检修电话线路，训练业余广播技术人员，为全面发展农村广播网作技术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同年夏，全县14个区，除一个永径区外，其他都在区、乡政府电话点附近共安装上300个喇叭，从此揭开了县农村有线广播网建设的新纪年。

1957年广播站在大坝里原站址改建起一座楼房，设施初具规模。机房有自然通风散热设备，在青砖地面上铺设了木板工作棚。增加了扩音机、录音机各二部，四波段收音机一台，还有较完善的配电开关装制。播音室采用隔音纸板为隔音墙，观察窗口用双层玻璃，双层隔音板，创造了较好的播音条件。农村广播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一年分二批建立起分级广播站共有新陂、宁中、泥陂、罗岗、龙田、水口、宁新、石马、叶塘等39个，全县安装了舌簧喇叭1200个。各乡广播站设有150——250W扩大机一台，把广播节目输送到各个收听点。到1958年冬实现公社化后，全县16个公社都建立起公社广播放大站，广播线路逐步架设到院户，安装了喇叭10,300个。其时为使广播事业得到巩固和发展，大部分公社成立了大队业余广播管理队伍。这是广播事业发展的兴盛时期。同年底兴宁、平远并县，原平远县的仁居、八尺、大

柘、东石四个公社广播站隶属兴宁县广播站。至1961年分县时，又将这些站重新划归原县。

兴宁县广播站于1957年被评为广东省广播系统先进单位。1959年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在兴宁举办为时一个多月的全省编播现场干部训练班，兴宁广播站介绍了编辑、采访、播音、文艺等方面的经验。1960年出席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被评为先进单位，荣获奖状一张和《毛泽东选集》一部。

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广东省委整社工作团，认为广播是非生产性开支，是刮“共产风”的祸根，提出要“停车让路”，因而兴宁县广播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其时公社广播站全部下令停办，广播员被解雇，个别公社还把广播机卖掉去赔“共产风”。农村广播只好由县广播站强力输送。后来由于农村广播无人管理，广播网路和喇叭也受到严重破坏。这可说是自办广播以来所出现的衰落期。

1964年，国民经济有所好转，广播事业又呈现生机，全县27个公社恢复了广播站，并架设了五条广播线，使附城8个公社由借用电话线输送广播实现为专线广播，这是一大进步。这一年4月，兴宁广播站出席了全省广播工作会议，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南方日报》也发表了兴宁广播站写的题为《我们怎样办好广播网》的经验介绍和县委书记栗恩仲写的《充分发挥有线广播的战斗作用》的文章。9月又出席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召开的有线广播经验交流会，印发了兴宁广播站《整顿、维护管理广播网》的经验材料。1965年兴宁广播站出席了广东省政府召开的全省先进单位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被评为省先进单位，荣获奖状一张。1966

年出席了省召开的宣教系统单位和个人代表会，被评为先进单位，荣获省政府奖状一张。

“文革”动乱期间，兴宁县广播站先后被改称为“兴宁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广播站”。广播事业曾遭受到一定的损失，因当时“两派”群众组织搞武斗，互相抢夺县广播站为他们所谓“夺权”服务。他们控制机房，损坏广播线路，因而造成1966年、1968年先后二次被迫停播二个多月。公社广播站也同样遭受控制和破坏，造成大部份地区杆倒线断。此后，广播工作一直在动乱中时有时无，起伏不定。直至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各级党政机构改革不断完善，县革委又于1969年春，就公社广播员编制发出了文件，人员相对稳定，这才使广播工作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同年，县广播站试用载波传送广播讯号获得成功，解决了广播时不能通电话，通电话时不能广播的矛盾。1970年又与县五金厂试制成功压电陶瓷喇叭，批量生产，解决了喇叭供不应求的问题。这都使广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至1973年，全县喇叭安装数发展到8万只，使全县356个大队通播，9千多个生产队97%通播。县广播站于1969与1970连续二年荣获省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1975年7月县广播站出席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在山西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村有线广播宣传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印发了兴宁广播站运用广播辅导群众学习马列著作的经验。9月《南方日报》发表了题为《兴宁县广播站协助县委办好广播讲课》的消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兴宁的广播事业在县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下，有了更进一步的巩固、提高和

发展。根据中央关于建立有线广播要走独立传输体系的指示，县广播站自1976—1982年，用了五年的时间，采取县社结合，以县为主的办法，对广播杆路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建设。县社两级共投资25万元，竖起水泥杆近6千条，架设了县至43个公社的双线广播专线3百多公里，216个乡也架设了广播专线，长达2千多公里，安装了院户喇叭1万7千多只，从此建立起以县广播站为中心，公社广播放大站为基础的独立传输体系。这就完全解决了广播长期借用电话线输送，使广播与通话发生矛盾的大问题，提高了广播质量。这是兴宁广播事业的又一次发展、又一个兴盛时期。

兴宁县广播站从1954年建设以来，结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根据内容的需要，广播形式主要分两大类：一是文字宣传形式；二是文艺宣传形式。方法上1954—1965年采用直播，1966年以后，采用录音。自1958年起广播站以自办节目为主，转播上级电台节目为辅。历年来采用过的具体节目名称有：本县新闻、大众科学、可爱的家乡、祖国各地、一周时事、城乡市场、工交战线、法庭内外、革命英烈、农村新貌、专业户园地、发展山区经济、今日侨乡、听众信箱、经济信息、天气预报、文化生活等30多种，可算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办站三十多年来，兴宁广播站充分发挥广播的广泛性、灵活性、速度快的特点，在及时宣传党的政策、法令，宣传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新经验，以及传递各种信息等方面，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极大程度的活跃了城乡群众文化生活。

兴宁广播站建站以来，曾有四次较大的农村广播网的建设：一是借用电话线传送广播节目；二是用载波传送广播节

目；三是架设专线传送广播节目；四是建立调频广播电台。改有线为无线发射，形成有线无线相结合的农村广播网。每一次都有新的大发展。在广播机务操作、技术改革方面，结合当时的实际需要也不断改进，创造了新鲜经验。1957年，在广播技术改革中，机务员林利泉采用自制线间变压器，分级安装匹配扬声器，使不同距离的喇叭能达到理想音响效果的新技术处理方法获得成功，省广播管理部门推广过《林利泉先进操作方法》经验，印发小册子供广播系统学习。广播技术组在技术革新方面的项目，如：小功率交流机改装直流机载波广播、改装250W扩音机、陶瓷压电喇叭、自制避雷器、自制振动阻等，都收到良好的效果，解决了许多当时不容易解决的困难。此外，在人材建设方面，历年来通过开办短期训练班的方法，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员，使他们都能开机、架设线路、排除故障和办广播节目。这些都很好地促进了兴宁广播事业的发展。

兴宁县广播站建站以来，先后的负责人有：站长：范芝祥（县委宣传部长兼。1957—1959）、副站长傅汉祥（1957—1961）、陈义声（1960—1966）。“文革”动乱期间，兴宁广播站改名“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广播站”，陈义声为革委会领导小组组长（1967—1968），后又改名为“兴宁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兴宁县人民广播站”，陈义声擢升为站长（1968—1984）、副站长为陈新桓（1983—）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的繁荣好转，广播事业也朝着电视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1978年，丰顺县八乡山粤东电视转播台建成发射以后，电视机迅速大量的进入了兴宁城乡的机关、学校、家庭。在这新的情况下，为加强领

导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县于1984年秋成立了“兴宁县广播电视局”。先后局长为潘波（1984·7—）、范勉勤（1987·8—），副局长有李保珍（1984·7—1985）、陈新桓（1987·4—1988·12）、何庆朋（1985·10—）、龚森源（1987·10—1988·10）。陈义声为调研员。广播电视局主要负责全县广播电视方面的宣传、行政、事业、音像、技术等业务。下设人秘股、事业股、宣传股、服务站、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服务部，以及乡镇级广播电视站等部门和单位，开展具体业务工作。与此同时，自1982年起兴建的面积600多平方米的四层楼房，作为广播电视大楼开始使用，设备更为完善。这就使广播电视事业又有了新的进展。

到1988年底，地处边远的罗浮、黄陂、龙北、大坪、径心、四望嶂山区，都自筹经费兴建起电视转播台，使整个县境内的电视复盖率达到80%，人们可从二频道、八频道、十二频道、十四频道收看到中央电视一台、二台和广东电视岭南台、珠江台的四套彩色电视节目。据统计全县已有彩色、黑白电视机40,000多台。城镇居多，平均每二户就有一台电视机。此外，全县还有录像放映点18个，录音制品销售摊点225个，有投映电视机和录像机40多台。为了更进一步发展广播电视事业，根据四级（即中央、省、市、县）办广播电视，四级（即无线、电视广播、有线广播和音像为中心）混合复盖的原则，县拨出专款，加上旅港爱国实业家刘宇新、伍铭真先生的捐款赞助，从1986年以来，先后兴建起电视台、卫星地面接收站、调频广播电台，并增添了4台摄像机。如今兴宁的广播电视事业正方兴未艾，蓬勃发展。

五十年代的工人文工队

范 晴

1949年8月，兴宁县重新解放后，陆仁布厂、西庄布厂等纺织工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店员工人在载歌载舞的欢欣日子里，相继组成了歌咏队、秧歌队等文化队伍。1951年8月，兴宁文工团组织了一次下厂活动，分别深入到店员、纺织、手工业、公路运输、搬运、建筑等基层工会，组织辅导工人学习时事政治和开展文化宣传活动。短短二个月的时间，就在县城工人群众中播下可观的文艺种子，各基层工会都涌现出一批文艺骨干，相继成立了店员、纺织、手工业、建筑和联合文工队，参加工人文工队的男、女青年工人合计140多人。这些工人文工队的队员，在五十年代，成为兴宁县城各个运动中宣传和文娱活动的主力，也是兴宁县城几个大型演出活动中的重要力量。1953年演出《翻身报血仇》，1954年演出《春风吹到诺敏河》，1957年演出《万水千山》都吸收不少工人文工队员担任演员或演出工作人员。重

大节日，搬运工人组织表演的《英歌舞》，百余人行动，以潮州大锣鼓配合，声势浩大，雄伟壮观，万众沿街观赏，轰动兴宁城内外。兴宁工人文化宫的各项活动，靠工人文工队员用业余时间义务管理；各地艺术团体来兴演出，靠工人文工队员和工人纠察队员义务监票、带票和维持秩序。他们日间从事紧张的劳动生产，晚上参加各项活动，从未享用分文报酬，其服务精神和服务态度，都是难能可贵的。

纺织文工队，是由当时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几个纺织厂的职工组成，由纺织工会脱产干部何文钦任队长，以朱伦、曾强章、刘仿珍、刘新、黄兰英（女）、赖亚香（女）等为骨干力量。他们的活动，以饭堂广播、出版黑板报等进行生产鼓动为主，也演出小型文艺演唱，他们编演的小话剧《约爱人过中秋》和《纺织舞》颇受职工群众欢迎。店员文工队，由各私营商店的青年职工组成，由店员工会脱产干部张洪福任队长，以张文强、罗仕考、罗丁祥、陈思保、王志达、王瑞良、刘绍松、朱舜莲（女）等为骨干力量。由于当时的私营商店极少女店员，他们吸收了一中女学生黄彩虹和新陂中学女学生黄惠英参加演出活动。建筑文工队，是城镇建筑工人的文艺队伍，以许松辉、高映辉、彭春祥、林秀英（女）、罗金妹（女）、曾美纯（女）等为骨干。手工业文工队，是由缝纫、理发等几个基层工会的青工组成，以刘振炎、谢质环、黄绍安、陈碧璇（女）、张惠香（女）等为骨干。联合文工队，是由城镇碾米、玻璃等几个基层工会的青工组成，以黄广基、陈伯为、郑国通、郑国秋、罗顺泉、廖超明、陈碧霞（女）等为骨干。此外，泥陂、罗岗等较大的圩镇，也成立了工人文工队。这些工人文工队，平时配合生产和政治

运动，以山歌、小演唱、歌舞等形式进行宣传活动，在当时是颇有成效的，其中店员文工队编演的《爱国卫生》和建筑文工队编演的《建筑工人舞》等，都颇受群众欢迎，经久不衰。

1953年元旦，配合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兴宁城镇五个工人文工队联合演出大型话剧《六号门》。该剧由工人文化宫干部范晴执导，除在人民礼堂演出五场招待全城职工以外，还公演二场，效果良好。1955年，五个工人文工队合并成立工人文工团，由工人文化宫干部王志达任团长。那年“五一”节，工人文工团演出了大型话剧《幸福》，仍由范晴执导。《幸福》反映了新中国工人在生产和技术革新运动中的生活和斗争，剧情、人物生动风趣，在工人文化宫礼堂演出五场招待全城职工，在配合城市生产运动中，也收到良好效果。

工人文工队以及后来的工人文工团的成员，一直是各基层工会在生产和各项运动中的核心力量和活动分子。在参加文化宣传活动中，政治上和文化素质上都得到了锻炼与提高，部分成员后来被吸收为专业文艺战士，更多的成员，后来都成为党、政干部和工商企事业的骨干力量。

纪 念 篇

纪念兴宁县启蒙运动先驱 肖惠长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李洁之

当此国家大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以改革统驭全局的时候，我时时都在想到我县乡贤、启蒙运动的先驱肖惠长先生。因为他的一生都是在致力革命和改革中渡过的，对兴宁社会的影响作用，是广大深远的。

肖惠长先生是我县叶塘人，生于一八七六年，卒于一九四九年。他在十八岁时就考取了秀才，一般说来，都会走科举门径，献身封建王朝以图取功名富贵。可是，他却能顺应潮流，到汕头同文学堂攻读新学。他的思想最初受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熏染，但八国联军陷京后，就认识到非彻底推翻腐朽的满清封建帝制，则无以救中国。惠长先生生前曾对我叙述过他思想的演变，他说：“自甲午对日战争失败后，忧时爱国之士，都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当